

见证与塑造：纪录片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张宗伟 石敦敏

内容摘要：百余年来，在民族自觉、民族解放、民族团结以及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纪录片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与建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与“塑造”作用。纪录片通过真实可感的影像，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新时代新征程上，纪录片应该更加自觉地用纪实影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

关键词：纪录片；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张宗伟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石敦敏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与海外市场动态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ZDA27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电影意象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4YJC7601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百余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纪录片一直以真实可感的纪实影像，生动体现中华各民族命运相融、利益相连、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丰富了“国家相册”，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与情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艺术力量。

一、战时纪录片：表现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历程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

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①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变，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迫使中国人民开始反思自我身份与主体性，强大的外部压力也促进了内部的聚合与发展，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自觉之路。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共同体逐渐凝聚。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近代中国反抗西方列强的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伟大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

（一）早期纪录片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②的概

念。1917年，李大钊发文“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③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李大钊积极号召人民共同抵抗外敌入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李大钊的主张是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李大钊一样，孙中山也强调民族独立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同盟会政治纲领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④中华民国成立时，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⑤在1924年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强调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理念。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在构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塑造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的中国纪录片创作者积极参与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中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以一批珍贵的纪录影像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留影存照。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上海的杂技幻术家朱连奎立即“筹集巨资，聘请摄影名家，分赴战地，逐日摄取两军真相”，^⑥将武昌起义制作成新闻片《武汉战争》（1911年）进行放映，深受观众欢迎。1913年，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上海战争》，真实记录了声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内容。作为时代的目击者，最早的新闻纪录片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过程呈现于银幕之上，让民众真切感受到民族解放的艰辛与希望。

20世纪20年代以后，创作者进一步将纪录片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话语实践，在对“中华民族”的想象与建构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中国纪录片的先驱黎民伟不仅最早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而且身体力行拍摄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21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等一系列记录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北伐战争期间，黎民伟又随军拍摄了几次著名战役，最终剪辑制作成文献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年），全面

记录了大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集中展现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成为宣传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民族的有力武器。

抗战全面爆发后，黎民伟南下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将此前拍摄的素材重新剪辑并录音，制作成有声片《建国史之一页》（1941年），通过再现革命军英勇奋战的激烈战况和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经典画面，全面叙述了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勋，以及他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盛况。抗战胜利后，黎民伟把《建国史之一页》改名为《勋业千秋》（1946年），^⑦并亲自为该片撰写了旁白：“这是一部中国革命历史最伟大的影片……这一段伟大的勋业，亦足为我们处在目下国际风云变幻、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今天，时刻加以警惕。进一步警惕我们该怎样效法当年革命精神，来完成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由、独立、强大！”^⑧1953年10月，黎民伟在病危之际托付妻子将该片拷贝带往北京，捐赠给中央电影局。从早期的新闻纪录片到《勋业千秋》，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篇章被定格在影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黎民伟为中国纪录片奠定了“以集体主义视角展示群体性政治运动，并在其中展现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以及民族精神风貌的创作范式”。^⑨他的一系列纪录片作为历史的见证，为中华民族留存了珍贵的共同记忆。黎民伟通过纪录片成功地塑造了孙中山这一彪炳史册的领袖形象，引导观众对中华民族英雄产生敬仰与崇拜之情，激发了民众对于中华民族自由、独立、强大的信念，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

（二）抗战纪录片与全民族广泛动员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促使国内各民族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政党、阶级的人们团结起来，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话语。这一时期，纪录片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充分重

视，成为对内凝聚民族精神、对外抗击侵略者的有力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和电影界的有识之士借助纪录影像，把全民抗日的目标与各族人民朴素的民族情感相融合，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从而助推中国人民增强民族自觉。

1931—1937年，表现国民政府军队爱国将士英勇抗日、反映群众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成为纪录片创作的主流。例如，《上海之战》（1932年）歌颂了十九路军抗日将士的壮烈英勇，《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3年）展现出东北义勇军坚决抗日的坚强意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纪录片拍摄的主力由国民党官方电影机构担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当时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立即拍摄了抗战纪录片《卢沟桥事变》（1937年），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和我国守军奋起抵抗的情况。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抗战特辑》（1938年）中记录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也积极进行文化建设，利用纪录片进行政治宣传。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成立后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全面反映了八路军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前线的战斗和生活，让国内外观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1943年）记录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创举，歌颂了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高度肯定了抗战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会议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之一是要“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⑩与此相呼应，这一时期出现了《民族万岁》（1940年）、《西藏巡礼》（1940年）、《新疆风光》（1943年）等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它们将各族人民纳入统一国家建构的

框架体系，赋予每一位中华儿女“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中，郑君里导演的《民族万岁》成为纪录片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峰之作。该片以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素材全景式地描绘了藏、蒙、苗、瑶、彝、回等各民族支援抗战的英勇壮举，展现了各民族在抗战时期的牺牲精神，凸显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团结与坚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画面和民族记忆，成为研究抗战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

二、民族志纪录片：建立新中国少数民族的影像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少数民族内容便成为中国纪录片创作的重要选材范畴，大量优秀作品陆续涌现，留下了珍贵的民族史料。

（一）科学记录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保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进一步推进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从1957年至1976年间，中科院民族所联合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拍摄了一系列“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简称“禾目王片”），旨在通过纪实影像系统记录和复现中国少数民族的自然景观、文化风俗和社会历史。这些纪录片成为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搭建了桥梁。

由于复杂历史原因的影响，原定为每个少数民族拍摄一部纪录片的计划未能实现。首批完成的“民纪片”（1957—1976年）主要包括《黎族》《佤族》《独龙族》《凉山彝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鄂伦春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等15部。参与拍摄的人员不仅有电影创作者，而且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专家，以及大量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少数民族成员。纪录片拍摄的地点涵盖了西藏、新疆、黑龙江、云南、四川、海

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区域。1976—1981年，又有第二批共6部“民纪片”面世，包括《僮人》（1977年）和1981年前后完成的《方排寨苗族》《苗族的节日》《苗族的舞蹈》等5部反映苗族内容的纪录片。“民纪片”通过记录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使观众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传承、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从而增强各民族间的认同和尊重。《凉山彝族》（1957年）表现了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奴隶制社会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见证了彝族社会在民主改革前后的巨大变化。《西藏农奴制度》（1960年）揭示了西藏农奴制度的黑暗统治，展现了农奴制度废除后西藏的巨大变，通过新旧社会对比，展现社会变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增强了藏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民纪片”在最初拍摄时的定位是“科学纪录片”，“摄制科学纪录片的目的是纪录少数民族原来的社会面貌，主要是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同时根据需要向有关人员进行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⑩为了保证作品的科学性，所有初编好的片子都要由学术权威把关。这些纪录片保留了那一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对于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比如《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1959年）记录了鄂温克人的游猎生活、宗教活动和文化传统等，展现了鄂温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他们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精神面貌。《独龙族》（1960年）记录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独龙族的生存环境、经济活动和宗教仪式等，展现了独龙族人民适应环境、发展生产的努力以及生活方式的逐渐变化。《赫哲族的渔猎生活》（1964年）记录了黑龙江赫哲族的渔猎生产、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等。通过影像留存濒临消失的原始部落制度和多元文化，这种“文化救险”无疑具有重要的人类学价值，因此“民纪片”后来被学界公认为中国民族志影像的代表作。

除“民纪片”之外，“十七年”时期还拍摄了不少表现各民族团结友爱主题的纪录片，不仅展示了各民族的传统习俗，还以真实的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为背景，记录了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历程。《中国民族大团结》（1950年）生动展现了各少数民族代表从边疆来到首都北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的场景，以及他们在国庆大典和联欢活动中的风采。《欢乐的新疆》（1951年）、《西南高原的春天》（1954年）、《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1955年）、《欢腾的西藏》（1960年）等聚焦于少数民族的生活变化，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生活和新风貌，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贡献，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二）文化传承与搭建民族交流的影像桥梁

改革开放之初，《摩梭风情》（1981年）、《傈僳欢歌》（1982年）、《绿色的墨脱》（1983年）等片客观记录了摩梭族、傈僳族、门巴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在继续发扬此前“民纪片”档案文献功能的同时，也以相当篇幅表现自然环境以及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活。此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对少数民族地区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的展示。从1983年开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计划地拍摄中外系列风光片，其中，中国风光片系列《愉快的旅行》总共拍摄了近30集，如记录少数民族地区风光的就有《火把节》（1984年）、《彝族婚礼》（1984年）、《壮乡观奇》（1984年）、《羌寨散记》（1986年）、《湘西苗家》（1987年）、《湘西风采录》（1987年）等。这批少数民族风光片又被称为“风情片”，与此前的“民纪片”相比，更强化了视听呈现的艺术性，并借助影视合流拓宽了传播渠道，发挥了文化记录和传播的“民族影像志”功能，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1982年，“民纪片”的开拓者杨光海提出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改称“民族志电

影”的建议。^⑫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民族志影片”取代“民纪片”的概念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共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包括“民纪片”在内的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中国民族志影片，国际社会更加直观地了解了中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变迁以及人民生活，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志纪录片进入创作高峰期，一方面坚持“守正”，即坚持“民纪片”忠实记录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科学性立场，坚守民族志纪录片的人类学价值，比如《沙与海》（1990年）通过对比两个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方式的家庭，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最后的山神》（1993年）展现了鄂伦春族最后一位萨满孟金福在现代社会中对传统信仰的坚守。这两部纪录片接连荣获亚洲—太平洋地区广播联盟（ABU）电视大奖，标志着国际影视人类学界对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认可。另一方面坚持“创新”，即将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中国新纪录运动的拍摄理念贯穿到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中，比如两部藏族题材纪录片《藏北人家》（1991年）和《八廓南街16号》（1996年），以及记录广西壮族自治区山区孩子们艰难求学历程的《龙脊》（1994年）、讲述泸沽湖地区摩梭女性肖淑明传奇人生故事的《三节草》（1997年）等，都摒弃了传统的民族志纪录片“画面加解说词”的表现模式，转而采用长镜头、跟拍、同期声等直接记录的拍摄手法，以强化作品的纪实性。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志纪录片在注重纪实性的基础上，更加讲究文本的叙事技巧和表达创作者的人文关怀，比如刘湘晨导演的系列纪录片《山玉》（2002年）、《新藏线上》（2003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2004年）、《海拔5300米的古那》（2006年）、《水来了》（2006年）、《驯鹰人》（2009年）、《阿希克：最后的游吟》（2010年）、《归去来兮》（2011年）、《帕米尔》（2013年）、《开斋节》（2015年）、

《大河的故事》（2017年）、《祖鲁》（2015年）、《一直看着你来的路口》（2018年）等，以精致的视听语言展现新疆帕米尔高原、阿里高原、藏北高原等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用独特的视角讲述边疆人民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思考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现实问题。其中不少作品在国际影视节展上展映并获奖，发挥了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功能。

三、新时代纪录片：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指引下，新时代纪录片肩负起时代使命，以影像整合、谱写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挥其特有的优势。

（一）以影像镌刻历史记忆、凝聚家国情怀

镌刻集体记忆和凝聚共同情感能够唤醒和增强群体的向心力和内聚力，是新时代纪录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新时代纪录片通过不断再现与重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抗争历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例如，《大抗战》（2014年）通过战场原声影像和真实照片，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国家相册》（2016年）依托中国照片档案馆馆藏的珍贵历史影像，讲述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以及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事迹，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了和平》（2020年）以多元化的叙事手段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体现出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志成城的家国情怀。

《他们与天地永存》(2020年)以人民为中心,从若干普通士兵的视角出发呈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展现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些纪录片在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中,有意识地从宏大叙事转向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达,从勾勒历史事件的脉络转向刻画历史情境中的人物,大大增强了纪录片对于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表现力。

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各民族之间数千年的深度交往、交流与融合,孕育了共同坚守与传承的文明成果,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内部聚拢,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共同体。厚植于民族文化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有助于增强民族生命力、创造力与凝聚力,为民族团结奋斗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以来,中国纪录片不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意象建构,将其凝铸为集体记忆长河中的闪光点,扎根于各族人民的心灵深处。例如,《中国通史》(2013年)“借助一系列文明意象和历史遗址空间意象的组合,勾勒出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脉络”。^⑩《河西走廊》(2015年)深入挖掘河西走廊这一标志性的文化地理意象的深刻内涵,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多角度,展现了从汉代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交流与碰撞。《中国》(2020—2023年)则通过挖掘对今日中国影响深远的人和事,回答“何以中国”的宏大命题,无论是古代的诸子百家、明君贤相、文人侠客,还是近现代的政治家、科学家、实业家和革命家,都成为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的重要意象。这些纪录片形象化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有效激发了受众强烈的民族情怀和文化认同感。《何以中国》(2023年)基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展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扎什伦布》(2023年)以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扎什伦布寺为切入点,展现近600年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讲

述历代班禅爱国爱教、促进民族交融的故事,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纪实书写民族团结与现代化进程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与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推进。新时代纪录片通过持续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建设国家的辉煌历史,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形成了全民族的奋进合力。一批纪录片以影像阐释“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理论内涵,书写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例如,《辉煌中国》(2017年)以全民参与的纪实手法全景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影像方志》(2017年)以国史、方志、家谱串联起国家、地区与家庭,通过传奇的地方故事、多彩的地方文化以及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土人情,充分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人民的小康》(2021年)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生动展现了小康生活给人民带来的幸福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征程》(2022年)聚焦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奋斗群体,全面展示了自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新时代纪录片也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讲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例如,《我从新疆来》(2016年)和《我到新疆去》(2018年)通过讲述新疆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奋斗故事,展现了一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画卷。《于青山绿水间》(2023年)记录了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因地制宜发展事业、振兴乡村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奋斗的图景。《石榴花开》(2019—2020年)用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日常生活翻天覆地

的变化，以点带面地传递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整体面貌。《海兰江畔稻花香》（2019年）展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6个贫困村在脱贫干部带领下，迈上致富道路的生动图景，凸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苗寨八年》（2021年）记录了广西苗族村寨八年间日新月异的发展，通过个体命运与时代发展的交织，反映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新时代云南民族影像志——团结进步的足音》（2023年）聚焦汉族和独龙族、白族、景颇族等15个云南少数民族，通过普通人的生活折射时代变迁，展现各民族在新时代的建设成就。《红石榴花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湖南探索与实践》（2023年）记录了湘疆两地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

除此之外，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和谐共融也是新时代纪录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现对象。《迁徙，在寻找幸福的路上》（2013年）记录了我国西南地区藏族、哈尼族、摩梭族等少数民族的迁徙生活，讲述了各少数民族在迁徙过程中相互依存和共同奋斗的故事，也呈现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和习俗。《吾守尔大爷的冰》（2013年）记录了77岁高龄的吾守尔大爷传承并坚守着维吾尔族几百年的传统冰镇饮料制作技艺的故事，展现了新疆喀什地区的巴扎文化、民俗风情以及时代变迁中的人文情怀。《风情中国》（2019年）通过全方位记录与展示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信仰等内容，凸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珍爱之地》（2024年）深入描绘了汉族、维吾尔族、回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与温情故事。这些纪录片不仅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各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还激发了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它们见证了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各民族之间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美好图景。

总体而言，新时代的纪录片不仅聚焦于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而且更加注重展现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实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形象，最大限度调动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各族人民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各族人民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

注释：

- ①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第18页。
-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2015，第75—76页。
- ③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303页。
- ④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总章》，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第284页。
- ⑤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第2页。
- ⑥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第9页。
- ⑦⑧黄健敏：《移影换形：从〈建国史之一页〉到〈勋业千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
- ⑨胡克：《努力用影像纪录“时代的面孔”》，《中国艺术报》2011年10月21日第4版。
- ⑩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57，第226页。
- ⑪杨光海：《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摄制工作总结提要》，载《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1982，第8—9页。
- ⑫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纪录影片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1982，第44页。
- ⑬张宗伟、史秀秀：《立足中国大地 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兼论历史纪录片的当代价值与现实观照》，《中国电视》2022年第9期。

（责任编辑：一申）